



客家、福佬

源流与族群关系

KEJIA FULAO YUANLIU YU
ZUQUN GUANXI YANJIU

研究

谢重光\著

 人民出版社

客家、福佬

源流与族群关系研究

KEJIA FULAO YUANLIU YU ZUQUN GUANXI YANJIU

谢重光\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研究/谢重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01-011511-5

I. ①客… II. ①谢… III. ①客家-民族历史-研究-中国②汉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105 号

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研究

KEJIA FULAO YUANLIU YU ZUQUN GUANXI YANJIU

谢重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1511-5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BNZ006）
及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目 录

导 论 / 1

- 一、客家、福佬在闽粤台的地理分布 / 1
- 二、客家、福佬形成背景的同与异 / 6
- 三、本课题的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 / 10

第一章 隋唐以前赣闽粤结合区的自然与社会状况 / 15

- 一、自然环境与远古居民 / 15
- 二、六朝隋唐时期赣闽粤结合区的溪峒社会 / 22
- 三、北方汉人的迁入 / 26
- 四、五溪盘瓠蛮的迁入 / 34

第二章 泉州人·漳州人·福佬人 / 44

- 一、泉州人的形成 / 44
- 二、漳州人的形成 / 55
 - (一)隋唐五代活跃在漳州的几种人群 / 55
 - (二)汉、越、蛮的融合 / 66
- 三、泉、漳的整合与福佬民系的正式形成 / 73
- 四、潮汕地区的福佬化 / 81

第三章 宋代湘赣闽粤结合区的社会变迁与民族新格局 / 92

- 一、宋廷对溪峒地区的开发、征敛与榷盐弊政 / 92
 - (一)开发溪峒社会 / 92
 - (二)强征枪杖手和峒丁 / 94
 - (三)榷盐弊政 / 95
- 二、峒寇、盐寇与汀赣贼之乱 / 98
 - (一)郴州“黑风峒寇”之乱 / 98
 - (二)晏头陀盐寇之乱 / 101

2 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研究

(三) 陈三枪“赣寇”之乱 / 102

三、畬族的形成 / 104

四、客家民系的孕育 / 111

第四章 南人、汉人的抗元反元斗争与赣闽粤结合区的族群互动 / 117

一、元朝对南方的屠戮与民族歧视 / 117

二、宋亡前后东南地区各族的联合抗元反元斗争 / 121

(一) 宋末东南地区南人与汉人的联合抗元斗争 / 121

(二) 宋亡前后赣闽粤结合区几次重大的抗元斗争 / 124

(三) 元中后期赣闽粤结合区各族的反元斗争 / 129

三、元代畬民汉化与客家、福佬民系的发展壮大 / 135

四、“汉人”、淮军与客家、福佬的融合 / 140

第五章 明清时期汀、漳、潮边缘区域的开发及福佬、客家的初步接触 / 145

一、汀、漳、潮三州边缘区域的开发 / 145

(一) 明中叶以前汀、漳、潮三州边缘区域的荒凉状况 / 145

(二) 明中叶后汀、漳、潮三州边缘区域开发的加速进展 / 151

二、汀漳潮边缘区域畬民的外迁与汉化 / 163

(一) 赣闽粤结合区梗化之民的族群属性 / 164

(二) 汀漳潮边缘区域畬民的外迁 / 168

(三) 汀漳潮边缘区域畬民的汉化 / 170

三、客家、福佬的接触与两个民系得名的由来 / 172

(一) 客家、福佬两个民系的接触与矛盾冲突 / 172

(二) 客家民系得名的由来 / 181

(三) 福佬民系得名的由来 / 189

第六章 明清时期台湾的福佬、客家移民及其相互关系 / 195

一、明末清初福佬、客家移民台湾的几个问题 / 195

(一) 关于客家移民迟来说再检讨 / 195

(二) 康熙末年台湾福佬、客家移民的比例 / 198

二、朱一贵事件与客家、福佬关系的演变 / 203

(一) 事件之前下淡水平原客家聚落的滥觞 / 203

(二) 事件中杜君英团伙的族群属性 / 210

(三)六堆义民及其评价问题 / 212

(四)朱一贵事件之后闽客关系的演变 / 223

三、福佬、客家民间信仰的分野与整合 / 229

第七章 当代台湾客家、福佬关系的新走向 / 235

一、隐性客家与福佬客 / 235

二、福佬沙文主义 / 241

三、客家运动 / 245

(一)客家运动的内涵、性质、成效及遇到的障碍 / 245

(二)客家运动的内部分歧 / 252

四、台湾客家、福佬、外省人的民族认同与统独倾向 / 260

五、台湾客家、福佬族群和谐相处、共存共荣之道 / 264

参考文献 / 275

后记 / 290

导 论

一、客家、福佬在闽粤台的地理分布

汉族从中原向南方拓殖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广府人、福佬人和客家人三个特点鲜明、自成系统的族群。这三个族群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互接触,但相对地说,客家人与福佬人的接触最为密切,不但远胜于福佬人与广府人的接触,比客家人与广府人的接触也多得多。因而客家人与福佬人的关系,包括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交流、融合,既是研究汉族在华南地区形成发展史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研究华南地区区域史应该十分重视的问题。

福佬人最初形成于福建南部的晋江流域、九龙江流域,然后迅速播殖于广东东部的韩江流域;客家人最初形成于福建西南部的汀江流域,然后迅速播殖于韩江上游及江西南部的章水和贡水流域。这两大区域,正是壤地相接的赣闽粤交界区域,因此可以说,广袤的赣闽粤交界区域,是酝酿形成福佬人与客家人共同的温床。

从后来福佬人与客家人的分布格局来看,不但俗称的福佬大本营与客家大本营毗邻,福佬人与客家人向外播迁形成的新居地也大多是相互毗邻。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就福佬大本营、客家大本营及这两个族群向外播迁形成的重要新居地做一粗略的探讨。

所谓福佬大本营,是指闽南、粤东讲汉语闽南方言或闽南次方言的地区。这个区域,也就是赣闽粤交界区域中比较靠海的部分,在行政区划上,它跨了今福建与广东两个省区,从次一级的政区(二级政区)看,它在福建省的部分唐宋时分隶泉州、漳州,明清时分隶泉州府、漳州府、龙岩直隶州、永春直隶州(这两个直隶州清初增设),如今则分隶泉州市、漳州市、龙岩市;它在广东省的部分唐宋时隶属于潮州、循州或惠州,明清时分隶潮州府、惠州府,如今则分

隶于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汕尾市。这个区域山川相连,语言和文化风俗相同或相近,即使在闽南与粤东之间,也并没有高山大河阻隔,所以属于同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区域和人文地理区域。这一特点,历史上早就为人们所认识。宋人余崇龟称:“初入五岭,首称一潮,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眷今古瀛,实望南粤,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①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更指出:“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②正是这么一个内部有着共同特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酝酿形成自成系统的福佬族群,而成为福佬人的大本营。

所谓客家大本营,是指赣闽粤边讲汉语客家方言的区域,也就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区域中靠山的那部分,包括赣南、闽西、粤东北三个片区。在行政区划上,它跨今江西、福建、广东三个省区,从二级政区来看,它在江西的部分唐宋时属于虔州(南宋改称赣州),明清时分隶赣州府和南安府,如今又都归属于赣州市;它在福建的部分唐宋时属于汀州,明清时为汀州府,如今分隶于龙岩市和三明市;它在广东的部分唐代分隶于潮州和循州,宋时分隶于梅州和循州、惠州,明清时分隶于潮州府、惠州府、嘉应直隶州(清初增设),如今都归属于梅州市。

当然,上述只是福佬大本营和客家大本营粗略的分野,实际上两个大本营的边界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犬牙交错的分布,从二级政区来看,明清时的漳州府、潮州府和惠州府都是福佬人与客家人杂居区。如明代的潮州府,固然主要是福佬人聚居区,但也有一些县份如程乡县、大埔县是纯客家县。惠州府是福佬人、广府人和客家人杂居区,其中兴宁县、长乐县(后改名为五华县)是纯客家县。清初程乡县、兴宁县、长乐县划出,与新从潮州析出的镇平县(后改名为蕉岭县)、平远县合设为嘉应州,但潮州府仍下辖纯客家县大埔县。从三级政区即县一级来看,福佬人与客家人杂居的情况尤为普遍。如漳州府属

① [宋]余崇龟:《贺潮州黄守》,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0《广南东路·潮州》引,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影印本,第3120、3121页。

②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境内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02页。

的南靖县、平和县、云霄县、诏安县,东南部沿海是福佬人聚居区,西北部山区却是客家人聚居区,至今这些县份的西北部仍有不少客家乡镇;潮州府属的饶平县和丰顺县,客家人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人们普遍流传,清代潮州十邑:潮安、饶平、澄海、潮阳、南澳、揭阳、惠来、普宁、大埔、丰顺,只有澄海无客,大埔无福。意思是说,清代潮州府所辖的十个县,除了澄海县是纯福佬人住区,没有客家人,大埔县是纯客家人住区,没有福佬人之外,其他八个县都是福佬、客家杂居县,差别只在于客家人所占比例高低而已。

明清时期福佬大本营和客家大本营都因人口的快速增长,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都开始了人口外迁的历程。加之清初的迁海与湖广填四川政策,大本营的福佬人、客家人大量外迁。福佬人与客家人外迁的方向和路线不尽相同,但有趣的是,福佬人与客家人向相同方向迁徙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因而,远离了福佬大本营或客家大本营之后的福佬人、客家人新居地,又有许多是毗邻而居的,其中以东南亚和台湾的情况最为突出。

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都有大量的福佬移民和客家移民,都是福佬移民与客家移民错居杂处。所以这些国家既有很多的福佬人会馆或其他的福佬人帮群组织,也有不少客家会馆或其他的客家人帮群组织。当然,由于这些国家的福佬人移民多,所以这些国家福佬移民的会馆或帮群组织并不以福佬为名,而是细分为福建人(实即闽南福佬人)、潮州人(潮汕福佬人)、客家人。有的分得更细,一个县或几个县组成一个会馆,如茶阳(大埔)会馆、永春会馆、永靖(永定和南靖)会馆等等。由于与本书主旨关系较远,这里对东南亚的福佬人、客家人杂居情况不作详细探讨,且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台湾的情况。

目前台湾的人口构成,原住民不到2%,其他98%都是各个历史时期从大陆迁到台湾的汉人。这些汉族移民中,明清时期以及光复前迁移到台湾的“本省人”约占85%,光复后移去的“外省人”约占13%。所谓“本省人”,基本上是由福佬人与客家人组成,其中福佬人约占七成,客家人约占一成多。^①从

① 台湾1989年时所做的人口统计,外省人占台湾人口13%,福佬人占73.3%,客家人占12%,原住民1.7%。但在2002年按照自我认定进行的族群人口统计,福佬人占近76.9%,客家人占10.9%(据台湾“内政部”民国“九十一年台闽地区国民生活状况调查”资料);而维基百科依据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2010年至2011年的调查,在客家基本法定义条件下,台湾的客家人占18.1%。各种统计数字的差别很大。

现实的分布状况来看,客家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区有三大板块,分别是:北台湾的桃园、新竹、苗栗三县,即桃竹苗地区;南台湾的屏东、高雄两县,即高屏六堆地区;东台湾后山地带的花莲、台东两县,即花东地区。此外,如台北大都会区和高雄市都会区以及其他的一些县市^①,虽然也有不少客家人,但基本被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福佬人所包围或淹没。

在客家人相对集中的三大板块中,桃竹苗地区客家人聚居面积最大、人数最多,区内区外“客家”与“福佬”界限分明,被称为“客家庄纵横又势众”的类型。区内桃园县除复兴乡为山地乡(原住民住区)外,其他12乡、镇、市可大致区别为南北两区。北区六乡、镇、市以桃园市为中心,居民大多为福佬人;南区六乡、镇、市以中坜市为中心,居民大多为客家人。全县福佬、客家人口比例相当。新竹县则有86%的居民是客家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客家县。但1982从新竹县析出的新竹市则以福佬人为主,客家人只约占20%。苗栗县客家人约占七成弱,福佬人约占三成,其余为外省籍和原住民。区内可分为山线、海线和中港溪三部分,海线闽南人多,中港溪和山线客家人占绝大多数。

高屏六堆地区包括屏东县的万峦、内埔、竹田、长治、麟洛、新埤、佳冬、高树八乡,以及高雄县的美浓、杉林、六龟一镇二乡。这个板块号称台湾客家第二大板块,但客家人的比例比桃竹苗区低得多。其中屏东县的客籍人口只占全县的十分之二强,福佬人占十分之七弱。高雄县客家人的比例更低,其中客家小镇美浓在保存客家文化方面有很突出的表现,但现在居民也大都会说福佬话,客家话说得很纯正的反而不是很多。

花东地区的客家人大多是甲午战争后日据台湾时期(1895—1945)移入的,属于客家人在台湾的二次移民,移出地区八成以上是北部的桃竹苗地区。在花莲县的人口结构中,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所占比例大体相当,族群互动关系很有典型性。其中客家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学界尚有争议,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以户来看,客家户(即户内居住成员至少一人是客家人)大概占全县户数的三分之一,但以口来论,客家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弱。台东县的人口结构也是闽籍最多,客籍其次,但客籍占多大比例不详。

当然,这是现在的情况,历史上台湾客家人与福佬人的比例以及客家人的

^① 这里使用的“台湾”政区名称,是2010年“台湾”政区调整为“五都”和若干县以前的名称。

分布状况,与此迥然不同。大致情况是,台湾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都有客家人的分布。当今客家人比较集中的三大板块不必说了,我们且看看一般认为没有客家人或客家人极少之地的情形。在北海岸,淡水、三芝、石门一带,曾有不少来自汀州府的客家移民,其中永定人数最多,武平、上杭次之,因而在淡水建有一所鄞山寺,主祀来自汀州原乡的定光佛,兼作汀州会馆。又如台北县西部的中和、新店、新庄、泰山、五股、三重、八里、莺歌、土城、三峡等地,历史上都有客家人拓垦聚居,成分以汀州客、漳州客为多,也有一部分四县客和潮州大埔、饶平客;台北市内的内湖、松山、景美、北投、中山、士林等处也可以找到历史上的客家踪迹。

东北部兰阳平原上的宜兰县,移民以漳州府福佬人为主,但有不少来自诏安、平和、南靖的漳州移民,其族群属性却是客家人,所以留下了几个称为“客人城”的纯客家聚落。其他的“城”、“结”(过去最小的垦荒单位)、“围”也有不少漳州客杂居其间。而兰阳溪以南罗东镇的北成、冬山乡的丸山、大兴、得安、顺安等地,则有粤籍客家移民入垦,至今这些村子的庄庙中,都有粤籍开拓先贤的牌位。

在中部台湾,台中—丰原都会区往昔是巴则海平埔族的势力范围。清雍正、乾隆时期,大埔客家人张达京在诏安客家人廖朝孔的帮助下,在此兴修水利,用水权换取巴则海的土地,招集汉人垦殖。其垦业遍及大台中地区,西达海线的清水,南边直到彰化市、芬园乡。其佃户以大埔同乡最多,因而使台中的丰原、东势地区成了全台湾大埔客家移民最密集、分布最广的区域。这一带的客家人除占绝对优势的大埔人外,也掺杂一些丰顺客家人和诏安客家人。东势以南上城、下城、大茅埔、软埤坑一带,也有客家人入垦,因为遭到泰雅人的武力抵抗,所以留下了当日客家人严密设防的“围屋”式民居建筑。

由浊水溪、北港溪、八掌溪等河川流域组成的西台湾大平原,现在被视为全无客家人的地区,历史上却有多种来源的客家人垦殖其间。如南彰化平原有饶平客,西螺七崁有诏安客,斗六地区曾建立“粤籍九庄”;云林、嘉义交界区域曾有西台湾平原上最大的客庄“五十三庄”,它是在不同时间内由不同来源(汀州武平、嘉应州、潮州饶平等)的客属汇集而成的;笨港周遭、嘉义城内以迄嘉义、台南交界处,也处处有客踪可寻。清初,这一境域内客家人数曾与福佬人相当,所谓“自下加冬(位于台南县后壁乡)至斗六门(今云林县斗六

市),客庄、漳泉人相半”,而“斗六以北客庄愈多”^①。

位于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旧名“瑯嶠”,现在的居民基本上是福佬人,但清代“居民尽是他乡客,一半漳泉一半潮”,来自潮州的客家人在车城建立了保力、统埔、射寮、四重溪等居民点,满州乡更是客家移民密集之处,今日著名的旅游休闲地“垦丁”,也因来此开垦的客家壮丁而得名。^②

总的来说,历史上台湾客家人的分布远较当今为广,客家与福佬移民的比例也远高于当今。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状况,客家移民或与福佬移民相互毗邻,或与福佬人错居杂处,两个族群互动密切,这与大陆原乡的情况大同小异。还有一点很类似的,是台湾客家人与福佬人的居住环境,也与大陆相仿,那就是福佬人多居住在沿海或平原地带,客家人多居住在山区和丘陵。所以如此之故,一说是因为福佬人先来(就大批的成规模的移民来说),先占据了沿海和平原环境优越的地方,客家人后到,只好到山区和丘陵落足;一说福佬人在大陆就居于沿海和平原地带,客家人在大陆居于山区和丘陵地带,他们迁到台湾后仍然寻找自己熟悉的自然环境扎根。不管真相如何,福佬人无论在大陆原乡还是在台湾,大多居于沿海与平原;客家人无论在大陆原乡还是在台湾,大多居于山区和丘陵,这是不争的事实。客家人与福佬人相互毗邻或错居杂处的分布格局,以及分别生活在沿海、平原与山区、丘陵,也就是各自的自然环境很不相同的状况,对于这两个族群的特点及相互关系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客家、福佬形成背景的同与异

客家与福佬,无论在大陆各自的大本营,还是他们移民在外的新居地如东南亚和台湾,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存在这么多的性格、气质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彼此矛盾冲突不断,人们不禁要问,这两个族群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他们都声称祖先来自中原,来到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却有的成为福佬,有的成

① [清]周钟瑄修、陈梦林纂:《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第135页。

② 以上关于客家人历史分布状况的论述,主要吸收了台湾学者邱彦贵、吴中杰的研究成果,见所著《台湾客家地图》,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1年版。

为客家?要回答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因为福佬与客家都各有一部复杂的形成发展史。本书对此各有专章进行讨论,这里只就这两个族群形成过程的同与异略作说明。

就同的方面而言,这两个族群的确都有来自北方(这里专指赣闽粤区域以北的地区,包括中原、江淮等区域)的移民,两个族群都认同中原文化,都以中原文化为正统。例如,福佬人中的泉州人,大多自称是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之后,或称先人是唐末随光州王氏入闽的;漳州人则多自称光州人陈元光之后,或称先人是唐初随光州陈氏入闽的,由此陈元光被漳州人奉为开漳圣王;潮汕福佬人则或祖述唐末光州王氏集团,或祖述唐初光州陈氏集团。总之,福佬人祖述的中原在光州,具体说是光州固始县。客家人也祖述中原,但他们自称的中原祖籍地并不限于哪一州哪一县,而是西到陇右东到齐鲁,北到燕云南到荆楚,中包晋、豫、川、陕、江、淮,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含很广阔的地域。不过,客家人无论来自东南西北哪一州府哪一县乡,大多自称迁徙途中都经过了宁化石壁,再从宁化石壁转迁各地。因而现在有人把宁化石壁称为客家人南迁的“中转站”,或称“客家祖地”。

显然,福佬人都祖述光州固始,客家人祖述广义的中原而自称南迁途中都曾经过宁化石壁,不可能是历史事实,至少不可能完全是历史事实,对此笔者已多次撰文予以辨正。^①但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福佬人与客家人如此认祖归宗,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文明史上蛮夷与华夏、边陲与核心的辩证关系。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中原代表着华夏正统,是文明、进步、高尚的象征;而边陲是蛮夷所居,是野蛮、落后、卑下的代名词。而且,离中原越远,即越边陲,就越野蛮、落后、卑下。处于边陲的人群,为了摘掉野蛮的帽子,洗刷野蛮、落后、卑下的印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祖根追寻到中原,让自己成为中原正统的正宗传承人,比现在在中原的人还要更“中原”。具体的做法,如果本族确是中原移民的后裔,那就强化自己祖先来自中原的记忆,如果本族本来不是来自中原,那就通过攀附的办法,逐渐形成“集体想象的记忆”,取得中原

① 参见拙著《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拙文《客家普遍溯源于宁化石壁的文化意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1期)、《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两篇系伪作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

人后裔的身份。正如台湾学者戴国焯所论：“客家人在长期流浪求生存的路程经验中，意识急切需求精神上的寄托，‘中原’这集体想象的记忆遂变成他们的价值中心，同时亦成为一种历史的‘真实’。然而‘中原’在何方，有无其‘事实’已不成他们探讨的所在。将客家之根源置于中原，将客家意识或是更高层次的客家精神，当做中原崇正精神的信念，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只要客家人自己这样相信，那就成为某种的‘真实’。”^①客家人有这样的“集体想象”，福佬人也有这样的“集体想象”；客家人通过这样的“集体想象”认同了中原文化，认同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福佬人也通过这样的“集体想象”认同了中原文化，认同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这是两个族群形成背景之大同。

两个族群形成背景还有一个基本相同点，那就是在族群形成过程中，都与国家权力的介入密切相关，都得益于中原文化的传播与渗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代活跃于湘赣闽粤边区被称为“汀赣贼”的群体，其身份介于“贼”与“民”之间，或脱离版籍揭竿而起成为“盗贼”，或被剿抚归顺朝廷重新被纳入版籍成为“版籍民”；还有明中叶赣南、粤东、闽西许多抗官自立打家劫舍的“盗窟”，最终都被镇压或招抚，从乱民变成新民，进而变成良民。推究这个历史时期这一区域“贼”演化为“民”的根本动力，国家权力的介入与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渗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那些“盗窟”转化为“文化之乡”的典型案列，第一步都是由于强大的国家军政力量的介入，“盗窟”被荡平之后，“贼”被收编为“民”；第二步是在乡村精英的倡导、带领下，崇文重教，移风易俗，参加科举，跻身官宦，最终洗清“盗”、“贼”的恶名，贴上“诗书礼乐”、“海滨邹鲁”的标签。这个过程，是“盗区”之民转化为客家或福佬的过程，也是“盗区”纳入“王化”及被“儒化”的过程。“贼”被收编为“民”是“王化”，“盗窟”变成崇尚诗书礼乐的“王化之乡”是“儒化”。乡村精英是乡村中首先接受中原儒家文化的人，也是使“盗区”接受中原文化传播和渗透的媒介。

客家与福佬有这样的大同，却最终成为在族群性格、气质和生活习惯方面迥异的不同族群，那是因为他们在大同之外存在众多之异。首先，从接受北方移民的情况来看，福佬族群形成于五代宋初，福佬大本营接受北方移民主要是在六朝至唐末五代时期；而客家族群孕育于南宋中叶，客家大本营接受北方移

^① 戴国焯：《对中国人而言之中原与边境——与自身之历史（台湾、客家、华侨）相连接起来》，《戴国焯全集8》，台北：文讯杂志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41页。

民的时间主要是在唐末五代至宋元之际,比福佬大本营接受北方移民的时间要迟好几百年。此外,上述两种北方移民迁出地也不尽相同,若据相关族谱所见,迁至福佬大本营的北方移民,比较集中在光州等江淮地区,迁至客家大本营的北方移民,则来自广义的中原,其范围很大。两种北方移民的迁出地域不同,迁出时间也不同,因此,固然都是北方移民,但彼此的种族成分和文化性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

其次,福佬大本营与客家大本营的自然环境和原住居民不同。就自然环境来说,福佬大本营处于沿海与近海平原,一部分居民以海为田,以舟楫为马,日久就养成了海洋文化性格;另一部分居民从事农业生产,但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日久也养成了比较悠闲舒缓的文化性格。客家大本营处于深山长谷或绵绵丘陵间,居民生计主要靠耕山和山林副业,条件艰苦,日久就养成了质直果毅、不事奢华、轻生梗化的山民性格。

就两个大本营各自的原住居民来说,虽然这两个大本营同处于古代百越的范围,土著居民同属于古代百越民族,但百越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涵盖了古闽族的七个支系即七闽,也涵盖了闽越族的不同分支如东瓯部落、南海王织的部落等等,在闽越之外又有主要分布在今浙江省的于越,主要分布于广东省的南越,主要分布于赣南的扬越,主要分布于广东西部至广西、越南的骆越等等,即所谓“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①。这些不同的分支、不同的部落,不同的种姓,在语言、风俗乃至生计方式方面都存在很多差异。例如,有的“居峒砦”,有的“家浮筏”^②;有的“薜鹿莫徭洞”,有的“网鱼卢亭洲(一作舟)”^③;有的是“林蛮”,有的是“峒蛮”^④。单以这山居和水居的两大类型而论,各自的语言、风俗以及生计方式一定是大异其趣的。

①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条李贤注引臣瓌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1669页。

② 〔唐〕刘禹锡《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使薛公神道碑》有云:“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峒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见《全唐文》卷60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缩印本,第2727页。

③ 〔唐〕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诗,见《全唐诗》卷2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第658页。

④ 〔唐〕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称房敞贞元末任容州经略使,“管有另外十三州之地,林蛮峒蛮,守条死要,不相渔劫”,见《全唐文》卷56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缩印本,第2523页。

参加两个大本营民族融合的成员,除了土著与来自北方的移民之外,还有不同历史时期迁进来的其他种族,其中迁入客家大本营的主要有以武陵蛮为代表的南方少数民族,迁入福佬大本营的主要有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蕃客,而九龙江流域也有部分武陵蛮迁入。两个大本营所接受的这些不同的外来种族,都作为重要成员分别参与了福佬、客家族群的融合过程,他们自然会把各自不同的文化因子带进后来形成的福佬文化或客家文化中。

总之,由于两个大本营的自然环境不同,其土著居民、所接受的北方移民及其他种族移民的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内各种族融合形成新族群的历程各异,都是分别形成客家与福佬两个族群以及造成两个族群在性格、气质和生活习惯方面迥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三、本课题的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在区域文化研究、汉民族内部的特殊支系如客家、福佬、广府人研究中,常常有人以血统论、种族论的观点看待复杂的民族或民族内某一系统的形成问题,以为民族内某一特殊支系的形成只是具有某种高贵血统的群体从北方迁移到南方的结果,所以这一汉族支系具有纯而又纯的中原汉族高贵血统;也常常有人凭空奢谈某某族群的优秀品质或伟大精神,不惜调动一大堆美好的词汇编织华丽的桂冠强加于某一特定的族群。这样的做法不能取信于社会,更不能取信于学界。历史学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以及遗传学的研究都一再证明,各地汉族与地理上接近的少数民族有很多血缘上的交流与融合,而同处于南方毗邻而居的汉族福佬人与客家人之间的血缘融合更多。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面,关于客家源流的探讨最多,其成果最能说明汉族客家系的形成,乃是汉族不同系统之间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长期融合的结果。例如,蒋炳钊指出:“客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必须是入迁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汉人和当地土著民族经过一段文化採借和涵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才可能出现客家这个民系。”^①吴炳奎认为客家

^① 蒋炳钊:《关于深化客家研究的思考》,原载《客家源》1993年创刊号,收入蒋著《东南民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386页。